

导 论

为 21 世纪的中国再塑丰碑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华夏古老的国门，以及随之给国人带来的耻辱和国人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惊诧、向往，中华民族便开始了奔向现代化目标艰难漫长的跋涉。在近一个世纪的跋涉途中，先后树起了三座丰碑。它们是：

第一座丰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以其全面学赶西方、强国富民的巨大感召力，将本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几乎所有能人志士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推翻了清王朝，创立了共和国，随即又基本铲平了各路军阀，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因此，我们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作本世纪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征途中树起的第一座丰碑。这也是本世纪第一个中国发展战略。我们将其称为三民主义发展战略。其特点是全面西化型的赶超或西化工业型赶超。遗憾的是，由于军伐割据混战、抗日战争爆发和国共内战升级，三民主义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饱含现代化目标和内涵的“民生主义”及其“建国大纲”未能在中国有效推进和实现。

第二座丰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城乡倡导和实施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其经济建设上推行“大跃进”，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尽可能降低人民消费、实现高度的计划经济等手段，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力图短期内实现工业化，最终赶超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西方大国的长期封锁，加上苏联因与中国意识形态冲突而中途撤销援助，中国事实上是在高度封闭的环境下依靠自力更生，闭起门来建设。尽管如此，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表现为：逐步建立起了基本的工业体系，挤进了全球军事大国和核大国俱乐部，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初步圆了强国梦。因此，我们将毛泽东的苏式社会主义比作本世纪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的第二座丰碑。这也是本世纪第二个中国发展战

略。我们将其称为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其特点是自力更生型的赶超或苏联计划型赶超。但是，它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昂贵的：在农村，农业生产大幅滑坡，农民食不裹腹，粮荒危及全国；在城市，日用工业品极其匮乏，工资冻结，失业严重，最后只能靠“上山下乡”来解决危机；国家财政枯竭，全国经济即将崩溃。社会主义战略走到了尽头，第二座丰碑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取代第二座丰碑，将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从濒临崩溃状态挽救过来并使之振兴的是——

第三座丰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本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执掌中国最高权力后，便制定和实施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即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动摇的前提下，经济建设上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由于中国奉行新的减少对抗增进合作的对外政策，加上国际形势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变化，使我们有可能一改毛泽东时代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做法，而采取打开国门搞建设的举措，如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对外交流和对外贸易，大量引进外资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市场机制，在继续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同时，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大基础产业的建设；重新重视农业，通过农村土地承包发展农村经济，缓解乃至最终解决粮食危机；通过发展城市经济和日用轻工业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全社会的有效供给，缓解就业危机；逐步深化企业及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控制人口增长，注重教育和智力开发；等等。随后，邓小平又提出了分三步走的具体战略构想。我们将其称为改革开放发展战略。其特点是外向发展型的赶超，通过近二十年的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取得了令国人欣慰、令世人瞩目的伟业，主要表现为：经济总体上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年均增长率达 10% 左右；综合国力明显增强，1996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近 700 美元；对外贸易迅速增长，

1996 年进出口总额近 3000 亿美元，其中出口 1500 亿美元，外汇储备突破 1000 亿美元；粮食连年丰收，1996 年总产量达到 9600 亿斤，人均拥有粮食 800 斤，12 亿人的吃饭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中国已进入中期工业化时代，工业品极大丰富，结束了工业品短缺的历史；科技教育文化体系基本健全；国防实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香港如期顺利收回。总之，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强国梦基本得以实现。所有这些，无不为中华民族下一步的腾飞和战略转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比作第三座丰碑。这也是本世纪第三个中国发展战略。我们将其称为改革开放发展战略。其特点是外向发展型的赶超或称东亚精英型赶超。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并实现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也积淀下了许多急待解决的头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多数并非全部是改革开放战略的罪过，而是与之前的社会主义战略一道所蕴含、所形成、所积累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三座丰碑、亦即三个战略，均为赶超战略。所不同的是，孙中山是全面西化型赶超，毛泽东是自力更生型赶超，邓小平是外向发展型赶超。或者说，孙中山和毛泽东是传统赶超战略，邓小平是改进赶超战略，邓小平是在孙中山、毛泽东基础上的改进和发展。因此，将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全部归罪于改革开放战略是不公平的。严格讲来，它们是赶超战略的必然逻辑结果或必然要面临的困境——

三大危机

一、增长危机

中国的经济增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表现在：

1. 工商企业大面积亏损，经济呈现负增长状态

一方面，据权威部门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工商企业的亏损面逐年扩大，现已接近 50%，亏损额也逐年增大，以至 1996 年上

半年首次出现净亏损额达 130 亿元。据国家统计局报道^①，1997 年 1~2 月国有企业盈亏相抵净亏 22.1 亿元，即再次出现净亏损，且净亏额同比增长 47.6%。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呈现 10% 左右的高增长，1996 年增长率为 9.7%。高经济增长率与高企业亏损率共存，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根据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微观上的高亏损率，不可能取得宏观上的高增长率，一定是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反过来，宏观经济的高增长率下也不可能出现微观经济的高亏损率。而实际情况是高亏损率是真实的，那结论只能是高增长率是虚假的。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杨培新教授调查表明^②，国企明亏、暗亏合计约占总数的 80%，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

另据刘迎秋所做的实际考察^③，如果把那些名义上企业有效益，而实际上企业呆帐、坏帐、死帐远远大于其实际收益，企业实际负债率超过 100% 的那些企业计算在内，估计全国国有企业大约至少有 70%~80%（甚至更高）处于亏损或半亏损状态。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邱晓华认为^④，目前国企 20% 长期亏损，近 20% 是新亏损，30% 左右稳定盈利。而笔者认为，30% 勉强盈利往往是在财务报表上做了手脚。另据人民银行监测的湖南省湘潭市 38 户大中型企业统计，1997 年一季度末，产价比去年同期增长 1.54%（如果剔除物价因素则为负增长）销售收入下降 7.3%（这是证明负增长的相对准确的数据）。亏损额增长 39.55%，亏损面达 70%^⑤。

1996 年 8 月 5 日在太原召开的国家经贸委限产压库工作会议和 8 月 10 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年会及学术报告会上，笔者应邀分别在两个会上作专题报告。在报告中首次提出一个新观点，即 1995、1996 这两年来，中国经济可能处于负增长状态，而非官方和多数经济学家所宣传的是 10% 左右的

高增长。笔者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

(1) 直接调查

笔者深入到 H 省 T 市进行调查。H 省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在全国属中偏上，T 市在 H 省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属上。应该说 T 市的增长速度应该能代表全国的平均水平甚至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调查结果表明，1995 年 T 市的上报增长速度为 18%，实际增长速度为 15%，扣除当年物价上涨因素 17%，为 -2% 的增长速度，即为负增长。1996 年比 1995 年还差。1997 年比 1996 年更差。T 市盈利的企业（包括国企、乡企、外企、私企等、屈指可数：90% 以上的企业亏损，乃至停工。H 省的所属市县中，多数地方企业亏损面在 70% 以上。

(2) 间接推算

1996 年上半年，官方公布国企净亏 130 亿，而同时官方公布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为 13.2%。如问官方为何故，官方回答：国企虽亏，但非国企增长很快。事实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对非国企逐一进行分析。

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H 省亏损面在 90% 以上。H 省 X 市在全省各地市县中经济效率排名第一，该市经贸委主任讲，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实际亏损面为 80%~90%，但上报时为 20%~30%，因为统计时将停产企业不算作分母，比例自然就降下来了。另据报道^⑥，全国乡镇企业产值约有 20%~30% 是虚假的，个别地区虚报比实际数翻几番。又据^⑦报道，辽宁省一个镇上报产值水份近九成。乡镇企业最发达的江苏苏南地区，乡企陷入窘境。1996 年 1~6 月，苏州市亏损乡企数增加 5.5%，亏损企业净亏损额增长 31.26%，营业收入下降 7.35%，流转税及附加下降 11.1%，利润总额下降 5.73%；南通市的形势更为严重，亏损企业数增加 37.43%，亏损企业净亏损额增长 147.2%，营业收入下降 15.1%，流转税及附加下降 16.9%，利润总额下降

125%^{⑧c}。苏南的乡企尚且如此，全国乡企状况不言而喻。

民营企业：所占比例很小，老板们普遍反映资金紧张、日子难过，关门歇业的不在少数；就连民企最集中的北京中关村地区，亏损面也达 80% 以上；北京科技报撰文反映，中关村地区的民营老板说，如今什么叫好企业，能按时给职工发工资的就是好企业。另据报道，据国家工商局提供的数字表明，1996 年个体经济呈负增长，私营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降低^⑨。

外企，即外商独资、合资企业：H 省的外企亏损率大体上与国企相近，同样多数亏损。

(3) 亲身感受

笔者及周边的人 1995~1996 年实际收入大幅下降，消费水平远不如前几年；另外，周边失业下岗和不能按时领到足额工资的人数明显增加；商业企业的营业额越来越低、亏损增加，以致难以为继已成不争的事实。1995 年中西部省区部分城市剔除物价上涨因素，生活费收入比上年相比出现负增长；其中沈阳、南宁、重庆三市出现收不抵支现象，兰州和呼和浩特减收面分别达 83% 和 65.3%^⑩。另据仲大军报道，1997 年一季度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销售收入实际为负增长^⑪。

(4) 海外专家估算

据报道，中国经济增长指数有偏离实际的高估。台湾经济专家综合分析中国发布的各项统计数字后认为：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重估，中国 1989~1991 年的实际增长率应校正为 1.7~4.8% 而在 1992~1993 年，由于物价上涨率高达 20~25%，在从总增长率中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以后，大陆实质经济增长率可能是负数^⑫。笔者认为，1994~1996 年由于实行宏观调控，增长速度只能慢于 1993 年，不可能为正增长，至多只能是无效增长。

李英田、刘筱霞认为^⑬，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往往包含着许多扩大的无效性部分——经济增长中的游动效应，从而给人一种假

象。例如，售出的新汽车的价值是和以处理废旧汽车为主的人的收入加在一起的，但后者是成本项目，应从前者中扣除而不应加在一起。此外，污染破坏生态环境，但却不减少 GNP（国民生产总值），相反，由污染导致的一系列治污活动却导致了 GNP 的增长。再比如劣质耐用品投入使用后，不得不为此追加许多非正常维修费用，无论从使用者或社会来看这都属于成本，但这种非正常维修费用支出同样是有效需求，结果成本反倒构成增长的 GNP，等等。

另据报道^⑩，中国国企 70% 以上已资不抵债，98% 的国企只能依靠国家银行贷款维持。

2. 金融风险极大，高通胀随时可能反弹

当前中国的金融业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全国第二大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农信公司倒闭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为了便于研究，笔者将金融风险划分为金融系统内的金融风险（简称系统内风险，又称直接风险）和金融系统外的金融风险（简称系统外风险，又称间接风险）。系统内风险主要指金融系统内部领导人经营管理不善和从业人员违法犯罪以及刑事犯罪分子抢劫诈骗等直接对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构成侵蚀的风险。系统外风险主要是指金融系统以外的宏观经济环境间接对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构成侵蚀的风险。系统外风险尽管是间接的，然而，它对金融机构来讲却是全面的、根本性的、且远大于系统内风险的最大风险来源。因此，它是笔者所关注的重点。事实上，系统内风险中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风险相当程度上也是系统外风险所引发的。造成系统外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选择了赶超战略或工业主导战略。要在一个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国家和人民都十分贫穷的大国实施赶超战略、推进全面工业化，最大的制约因素无疑是资金的匮乏。解决资金匮乏的对策无外乎是从国际和国内两

个资金市场上寻找出路。国际资金市场由于二战后的冷战格局及中国的外交政策取向，除了从苏联得到少量的资金（当然也包括管理和技术）支持外，所获几乎为零。这就迫使我们将眼光完全专注于国内资金市场。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行为，通过财政的高积累政策和银行的高储蓄（中国 50 年代初期市场资本年利率高达 30% 左右^⑬）政策强行聚集社会资金，然后重点投资工业领域。由于体制的原因，这期间不可避免地、大量地、经常性地出现财政向银行透支搞工业建设。这实质上就是国家强行动用大量银行储蓄从事长线工业投资，从此，就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

如果国家强行动用银行储蓄进行工业投资能取得预料的回报率，那也作罢。问题是由于下述原因回报率不可能如期望的那么高，大部分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从战略上讲，由于中国面临着诸多约束条件，赶超战略从根本上是走不通的，因而工业的投资效率从整体上讲是极低的；从宏观管理上讲，僵化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模式必然使投资出现重复、浪费、低效现象；从微观管理上讲，铁板一块的纯国有企业不可能获得较高的投入产出率。这样一来，全社会的综合投资回报率及产出率必然十分低下，表现为全社会的资产盈利率十分低下。据测算，1996 年全国的平均资产盈利率仅为 3% 左右，而同时，国家为了抑制通胀及提高储蓄率以利投资进而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得不将储蓄利率提到较高水平，如 1996 年的综合储蓄利率为 10% 左右。显然，这里就出现了 7% 左右的负差，致使企业的贷款负债率不断升高。尽管每年的差值不一定正好是 7%，但大多数年份出现较大负差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个负差通过几十年的日积月累，最后大多数沉淀到银行。这正如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指出的那样：企业本没有生产那么多的剩余财富，但是银行和储户要求有那么高的回报；企业的负担加重，近两年在整体上不能向银行

还本付息；而国家银行还要给储户付很高的利息，甚至保值利息。尽管利息提高，银行仍然虚收，因为财政从银行收税增多，储户、银行和财政由于提高利率而增加的收入在企业资产盈利率很低的情况下，只不过是一种货币数量在银行货币体系中的数量游戏，是给储户在银行账面上许诺增加存款回报（实际产业利润给储户的回报要小得多，结果是在银行中积累较多虚假的储户收入）。但是企业利润可供信贷资金再分配的蛋糕（利润）却相对越来越小，结果在银行货币体系中积累更多的不良资产和通胀压力，增大银行货币体系出现挤兑风险。用一个形象化的比喻来形容就是储蓄资金的“一女二嫁”，即储户将资金（一女）存入银行，银行要随时准备储户取兑，此为二嫁；而银行由于外部的压力和自身的动力将该笔资金大部分贷出（主要是国有工业企业），并且大多数形成呆帐坏帐等不良资产而难以收回，此为二嫁。这是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成因所在。据笔者对 H 省 J 市和 Y 市建设银行的调查，新贷出的款项本金几乎全部收不回来。只有 20% 能按时上交利息；30% 难以做到准时上交利息；50% 连利息都交不上，其中多数已成为死帐。另据人民银行湖南省湘潭市分行对 38 户大中型企业统计，1997 年 4 月末全市各家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高达 41%，较上年初上升了 7 个百分点，其中农村信用社高达 48%，少数信用社出现支付危机^⑩。由此可见全国金融形势一斑。事实上，如果没有银行属于国有、银行信誉等于国家信誉这张王牌；如果存款者还有其他选择，恐怕危机早就发生了。据透露^⑪，国有银行自有资金与各项存款余额的比例已从 1979 年的 31.9% 下降到 1995 年的 7.02%。照此速度测算，如果国家不大量印钞票注入银行，1999~2003 年就可能发生银行动荡危机^⑫。因为银行的承载力是有限的。而大量印发钞票注入银行又会引发恶性通胀，同样会引发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这是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两难困境，但又是难以回避的问题。苏联解

体前后曾出现高达 1000% 的高通胀率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反证。

3. 失业率居高不下，且不断攀升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披露^⑬：到 1997 年一季度末，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中，停减发工资的职工人数为 1096 万人，停减发离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 227 万人。全国下岗职工已达 900 多万人，困难职工和下岗人数达到历年来最高点。这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近来，各地频频发生的下岗人员的游行、静坐、冲击地方政府等恶性事件，就是明显的先兆。另外，企业现有冗员约 3000 万，农村富余劳动力 1.3 亿。加上每年新增就业人员 1000 多万。这样，中国现有失业人员就达 2 亿多人，保守地估计，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 24% 左右（冯兰瑞测算值）。如果如实的估计，失业率约在 28~31% 之间；如此高的失业率，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更为严峻的是，这一态势不仅没得到扼制，而且有进一步扩大之势。据估计，到本世纪末，中国将有 2 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安置^⑭。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也将成倍增加。这期间如不采取特别措施，失业率肯定将突破 30% 大关。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李迎生^⑮研究表明，中国目前隐性失业率高达 30% 左右，其人数在 4000 万左右。另据贾绍风、孟向京预测^⑯，在今后 15 年以内，中国劳动力过剩率都将保持在接近 30% 的水平上。预计 2000 年中国人口总数将突破 13 亿，按劳动力人口占总人数 69% 比例测算，劳动力总数将达 9 亿；如果是 30% 的失业率，则失业总人数约为 2.7 亿试想，2.7 亿失业者加上他们所赡养的家庭成员，波及人口面将达 4 亿。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强大冲击性是怎样估计也不为过的。

可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却不到 3%。对于这一巨大的反差，国家统计局科研所的程希认为^⑰，在于中国的失业统计概念与国际通行的失业统计概念相比存在重大的差异和缺陷。国际劳

工组织对失业的定义是，在一定年龄以上、在规定的调查时间范围内没有职业或工作时间没有达到规定标准，有劳动能力，且在寻找有报酬的工作的人。具体包括：因工作合同已终结或暂时停止，没有工作但正在寻找有报酬工作的人；未曾受雇工作，现在正寻找有报酬工作的人；已经退休，但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工作，并正在寻找有报酬工作的人；目前尚无工作，但已经安排好某一段时期后开始从事一项新工作的人；暂时被解雇而又没有薪金的人。而中国对失业的定义是，市镇非农业人口在劳动年龄以内（16 岁以上及男 50 岁以下，女 45 岁以下），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待业登记的人员（《中国统计年鉴》），从中不难看出两者的差异：在口径范围上，国外的失业人数包括城镇和农村的全部失业人数，而中国仅限城镇，这就大大缩小了中国实际存在的失业人口规模。外国通常对失业者只规定年龄下限，并无上限规定，退休后曾经工作并继续寻找工作者仍算失业者。而中国却规定了年龄上限（男 50 岁，女 45 岁），而且此年龄界线还低于国家规定的城镇职工的退休年龄，使得一些未到退休年龄的城镇失业者没有包含在内，这也缩小了中国城镇失业人口规模。根据国际惯例，各国通常都对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时间作了规定。凡是在一定时期内劳动时间累加不足于规定标准的人，被视为失业，列入统计范围，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规定。中国只统计年底城镇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并不能反映全年的失业状况。中国还没有能反映现阶段大量出现的不充分就业和隐蔽性失业现象的统计指标。⑥外国失业人口的统计数据主要是通过对住户的抽样调查获得的，而中国的失业统计数主要是通过在地方法政府劳动管理部门登记的失业人数汇总而来的。

4. 农业基础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

尽管近几年粮食丰收，1996 年总产量达 4800 亿公斤，人均

粮食达 400 公斤，但这是靠挤占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超量施用农药化肥为代价，以及加上风调雨顺换来的，因此基础是极不牢固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面积不断减少，继续挤占其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余地极其有限，而每年新增人口 1000 多万，新增口粮 40 亿公斤。靠增加粮田面积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

由于现行体制的制约，突破性的农业科技成果尚未问世，而且即使问世也很难在农村大面积推广应用；加上长期超量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地力下降，施用化肥的边际效益明显下降；以及长期超量使用农药，造成病虫害耐药性增强，爆发大规模病虫害的危险增大。因此，短期内靠增加技术投入提高粮食单产的作用将是十分有限的。

由于土地为集体所有等现行土地法律的约束，土地大规模向种田能手转移，从而提高单位产出率和单产量的可能性亦不大。

根据中国的气象规律，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之后，一定会伴随大的自然灾害出现。加上现有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年久失修，以及近年来由于滥伐森林、破坏植被、过度开垦等对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致使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干旱少雨等人为造成的灾害发生频率大幅上升。

上述因素如果碰到一起，势必造成农业及粮食的大减产，乃至出现粮食安全方面的危机。届时，尽管可以进口粮食，但是，如此大量的进口，国际市场能否满足供应？价格上扬后是否能被中国接受？中国是否有那么多的外汇支付？大量外汇用于进口粮食后对国内其他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难以预料的大问题。

如果仅从官方公布的有关粮食资料折算成粮食贸易依存度、

储备水平、变异系数和人均粮食占有水平等国际通行的指标体系来评价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中国的粮食安全水平都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些结论的成立是需要具备一些假设和限制条件的。比如粮食储备水平，中国虽比较高，但是以下述条件为前提的：

在作物歉收时，不论储备放在何处，都能够做到完全地调动和容易得到；②17%~18% 的最低储备水平仅仅用于防备一次性的粮食歉收，而不考虑两年及两年以上发生的粮食短缺；储备的不同品种谷物之间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上述三个假设条件中除第二个能够勉强满足外，其他两个都难以成立。就第一个条件来讲，由于体制、布局等原因，储备粮很难做到“完全调动和容易得到”，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擅自动用中央专储粮或伪造反报表、欺骗上级，以致发生亏库的现象。从第三个条件看，中国城镇居民的口粮消费中，稻谷的消费比重占 60%~65%，这种消费习惯有很强的刚性，这决定了小麦、玉米对大米的替代性很差，因此一旦某一粮食品种（尤其是稻谷）出现较大供需缺口时，很难用其他品种的粮食库存来平抑短缺品种粮食市场。仅以上两点就决定了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效率将大打折扣，仅仅达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低安全储备水平，并不一定能实现安全^⑤。

5. 财政已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境。

到现在为止，中央财政已累积下数千亿万赤字，完全靠发行国债度日。据报道^⑥，目前，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相当高，超过 50%，1997 年有可能接近 60%，如不加以控制，将有可能引发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省市财政绝大多数也是寅吃卯粮，中西部省区 60~80% 的县市财政出现赤字^⑦；县级财政则更惨，大约 2/3 的县公务员不能按时领到足额工资，拖欠教师和离退休干部工资更是常事。H 省有 88 个财政单位（含各地、市和省直管计划单列单位），其中 80 个单位不能按期兑现公务员调工资。

另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九五财政课题组的研究表明^②，1980~1995 年，财政连年赤字，赤字增长速度超常，年均增长 16.34%，远远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更为严重的是，财政赤字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且日益难以控制。仅 1991~1995 年，财政赤字累计为 2030.64 亿元。这是其一。其二，在财政平衡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债务还本付息的负担越来越重。由于财政赤字经常化，债务本息一般要靠发新债偿还。这样，债务的不断积累就形成了周期性的偿债高峰，而且新的周期起点高、增幅猛。1980~1995 年，财政国内外借款还本付息额增长了 29.1 倍，年均增长 25.48%。其三，财政已经难以支撑经济的发展，甚至难以支撑政府职能的实现。财政职能收缩很快，财政支出的增长大大慢于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前的国家财政已经不能充分保证重点投入和政府部门经费的必要增长，不仅中央财政难以发挥应有的宏观调控作用，而且有的地区连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正常履行。债务依存度（即当年财政支出中多大份额是依靠债务收入来满足的）上升很快。1995 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已达到 53%，大大突破了 20% 的国际标准。国家预算外的各种收费和基金越来越多，1994 年达 2000 亿元以上，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40% 以上。这是财政无力支撑各级政府职能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政府职能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靠银行部门。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银行来满足其职能的需要。中国政府实际已经不把银行当财政使用。九五期间财政将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其一，八五转移过来的大量债务在九五期间将自行扩张。如果九五期间财政能够自求平衡，不需发新债来弥补赤字，只通过发新债来将原有债务负担向后转移，债务负担在九五期间的自我积累也是惊人的。八五期末，中国内债余额为 3000 多亿元，基本上要在九五期间偿还，偿还的方式只能是借新还旧。按照八五的内债结构与发行条件，并假定到期债务按三

年期向后转移，向下世纪转移的余额将比八五末的余额增长 71.5%，这种增长完全是通过债务的自我积累形成的。其二，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将下降到 8% 以下。其三，财政支出矛盾进一步突出，通过压支出来平衡财政的做法难以为继。预计 2000 年财政当年赤字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将达 35%，当年债务发行量占当年 GDP 的比重将超过 8%，远远超过 3% 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其四，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财政已经不能回避，不是挺一挺就可以过去的： 国企债务问题； 社会保障问题； 外贸依存度提高后的中央财政出口退税问题； 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问题； ⑥经济结构的变化及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对财政的影响问题。

税收近年增长幅度较大，但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如前所述，近几年中国经济处于事实上的负增长状态，而税收却保持两位的高增长。其主要原因：一是税制改革后税赋增加了，据有关部门测算，税制改革后全国平均税赋上升了 15%。二是税收征管力度加大了，企业被逼得无奈，只好贷款交税，职工发不出工资也得先交税。金融系统由于改变了会计核算形式，实行权责发生制，只要发生贷款业务，无论贷款是否回收，无论是否有利润，都得交营业税和所得税，被逼无奈，只得拿储户存款交税。这样的做法可谓竭泽而渔，是决不可持续的。笔者在 S 省 H 市调查国税、地税两局局长，他们抱怨说：上级要求每年税收增加 20% 左右，而企业的效益连年下滑，根本没有能力交税，我们拼命征收，也只能完成递增 9% 的任务，真不知道以后的任务怎么完成。S 省为全国最发达省市之一，H 市属 S 省内中偏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可以代表全国的概貌。可是，中国从中央到地方，财政支出的速度却仍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递增，如果到时税收收不上来，巨额赤字除了加印钞票弥补以致形成巨额通胀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6. 国际市场屏蔽度加大，外贸出口越来越难

尽管中国外贸在八五期间增幅较大，但九五开局的 1996 年却出现了下滑局面，尤其是一般贸易出口明显下降，降幅为 28.5%^③。究其原因：从企业自身讲，是作为外贸主体的国有外贸企业缺乏动力和扩大出口的积极性。长期以来，外贸企业的低效率和高成本一直制约着自身的发展。这明显地反映在 1995 年全国地方外贸的全行业亏损。到 1995 年末，外贸经营亏损累计达 200 亿美元左右，1996 年 1~5 月份，全国外贸亏损面为 67%，比上年同期上升了 5.7 个百分点。^②从国内因素来讲，1996 年国家出口退税率下调，出口退税滞后，造成出口成本上升，竞争力削弱；加之信贷规模不足，使企业资金更趋紧张；另外，人民币汇率坚挺、物价上涨、各种综合费用提高等，亦使得出口成本接连攀高。从国际因素来讲，中国尚未加入世贸组织，不能享受其多边协议的权利，在国际竞争中暂处于不利地位。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中滋生的排他性和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出口冲击也很大。上述因素中，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国际市场加大了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屏蔽度。如果要冲破屏蔽，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亏损出口加上财政补贴，但这样做一是国内企业和财政难以长久支撑；二是会遭到国际社会反倾销制裁。最近以来，中国出口企业被起诉倾销案急剧上升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至于为多数学术界、舆论界引为自豪的宏观调控目标实现、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说穿了，是靠压缩需求、消耗设备和银行贷款、吃企业积累实现的。因为 70% 左右的企业亏损、2/3 的企业开工不足，不可能是发展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实现的平衡”^④。

二、发展危机

中国不仅在当前的经济增长方面面临巨大危机，在未来的发